

梦里不知身是客

王涵 著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梦里不知身是客

王涵 著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里不知身是客/王涵著. 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0. 11

· ISBN 978-7-305-07812-5

I. ①梦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20502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出 版 人 左 健

书 名 梦里不知身是客
著 者 王 涵
责任编辑 张婧好

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3 字数 37千
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07812-5
定 价 12.00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
电子邮件 Press@NjupCo.com
Sales@NjupCo.com(市场部)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

作者自序

日本人不忌讳“性”，不顾忌谈“性”。这并不说明日本社会道德败坏，日本人思想上有问题。我在庆应大学读博士时，日本教员与日本的男女学生也讨论“性”的事情，在他们看来这是很自然的。但我作为中国人出身的大学教员，就绝对不敢与学生谈“性”，甚至连这个字眼都会回避，怕会被认作是性暗示或性骚扰。

拿文艺来打比方吧，中国文艺有“文以载道”的传统，因而厚重、雅训、避忌与非道德性、不良性的纠葛，就像《琵琶记》所说的那样“不关风化体，纵好也徒然”，风教攸关，至为重要。而日本文艺以娱乐为本位，并不期待文艺对现实、社会、人生的作用和效果。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散谑浪笑傲，尽情地



撒野扯淡，海阔天空地瞎编作假。

日本是个没有任何物产资源的国家，有的只是地震、水灾、雷击（最近又加上了“女房”就是太太，并称为日本四大恐怖之物）。所以日本人畏惧自然，无限和无原则地崇拜自然，也把“性”作为自然的一个部分而顶礼膜拜。

本书是一本日本杂记而并非讨论“性”的专书，涉及日本社会、教育、文化、历史、法律等许多方面。对于到过日本的人，也许能唤起一点回忆；对于即将来日本特别是来留学的人，或许能有所助益。

2010年5月23日

目 录

自序 /

一、梦里不知身是客 / 1

二、打工是留学生之母 / 6

三、庆应义塾大学 / 13

四、富贵温柔之乡 / 19

五、“起雪” / 28

六、“能”的世界 / 33

七、感性的日本艺术 / 39

八、“性”与日本历史 / 43

九、太阳祭礼 / 51

十、日本社会的难解死穴 / 60

十一、日本大学教育的严冬期 / 66

十二、日本的法庭 / 70

十三、侦讯与攻防 / 77

十四、世纪之梦 / 83

一、梦里不知身是客

初到东京时，我在位于东池袋的东京语言学校上学。学校斜对过有一家叫做山手浴室的“梭不浪多”（有陪浴女的浴室），还有一家看三级片的小电影院，学校邻居则是一家偷窥部屋，写着有“学割”就是学生折扣价。身处这种声色犬马、酒池肉林的氛围，每天的上学、打工那种日复一日的生活也变得不那么枯燥了。

我上学后学校即停课了一星期，原因是一位台湾籍的刘姓教务主任被校长开除了，这位教务主任凭着很高的人气煽动全校教员罢课，直到校长收回成命。我对民主主义的认识就这样直观地开始了。那位台湾哥们在斗争胜利后旋即辞职，回台湾服兵役去了，但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，很是令我感慨。须知那时的日本还在泡沫经济的繁华时代，在日本有份工作和收入，是很令人心驰神往的事。

我们班级人少时有六个学生，多时达十二三人，



主要来自大陆、台湾、缅甸、泰国等亚洲地区。从大陆来的学生多有骄人学历，只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李兄是工人夜大出身。李兄燕颌虎颈，腰圆体壮，操一口流畅英语，对东京的风俗情讯了若指掌，且时有劝世之言。一日，班上某男欲呼朋唤友去山手浴室冶游，李兄正色曰：“该处的陪浴女皆为东洋悍妇，打工仔的身板骨不过徒惹嗤笑而已！”顿时打消诸人念头。北京大哥之忠勇仁义，经常博得赞叹之声。

那时，东京山手线主要区域的格局大致是这样的：台湾人控制着新宿地区，福建人盘踞着大久保，很快取代了台湾人进入新宿地区。池袋则是上海人最多的地方，有日本报刊尝谓在池袋随便扔一块石头，必中一上海人的后脑勺，这绝不是空穴来风。我们学校也以上海人为最多，我们班多时竟有一半左右是上海人。

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自费留学还颇为不易，那时据说来自国内的自费留学生还不到六千人。自费生们来路不同，大多有些神神叨叨，有的忙于打工挣钱，有的忙于考研，有的忙着找工作，不少女生则



忙着嫁人。自费生不同于公费生的最大之点，就在于其醉生梦死又是一盘散沙。

上海女生喜欢在“司娜库”(小型俱乐部)打工，这一点很不同于北京女生。“司娜库”工钱诱人，又只是陪陪酒，说说话，无关风月。那时的日本“入管法”也不严，常常对外国人网开一面。我打工的中华料理店也时有上海名校出身的妙龄女子前来求职，但大致到能开口说话的地步就不见了，后来才知道是去了“司娜库”。“司娜库”时给1500日元以上，不是我们这种时薪给六七百日元的料理店能比的。

日本人干活几乎是不停的，不停地炒菜，不停地洗碗，洗碗洗下来一天，手都得泡烂。跑堂跑一天，骨头都能散架。明明已经很累了，可客人一来，立刻精神抖擞，退后趋前，胁肩谄笑。没有客人时也要不停地找活干，擦擦桌子，装装牙签什么的，以免惹老板闲话。干下来一个月，能挣个六七万日元，交房租和学费还是够的，我那时一个月房租和学费才五万日元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电视，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。

我那时认识的两个女生是不用打工的。一位是



有着严重恋父情结的 C 小姐，几句话就得提到她父亲。C 小姐不算国色天香，但长得很可爱，跟人说话常常敞开双腿，春光乍隐乍现，可见其胸无城府。据她说她长到 16 岁时，洗澡还不避父亲。我开始以为 C 小姐的父亲是国内高干，后来才知道只是北京外贸局的一个处长。再后来 C 小姐的父亲被拘了，C 小姐说这都是为了她，每每泪不能已。C 小姐念的是一家每年学费要 120 万日元的日语学校，她后来考进了日本大学，交了 50 万日元后又考上了庆应大学，她如果去上庆应大学那么她先前的 50 万日元就算白交了，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先前交的钱打了水漂。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厦门的外贸局局长——某大军区副司令之妻也不过因为区区的十来万美金而丢了性命，C 小姐的父亲得捞多少钱，才能供女儿这样地挥霍呢。

当时还有一位 Z 小姐是不打工的。Z 小姐虽非金枝玉叶，却也是妍姿艳质，靡颜膩理，更兼交际广阔，花飞蝶舞，很快成为校花。她说起话来两腮含春，滔滔不绝且手舞足蹈，看似涉世未深却又深不可



测。一次放学后我到她家歇脚，相谈甚欢时，突然有某男电话打来，说是还有几分钟就要到她寓所了，Z小姐顿时花容失色，催着赶着让我走人，那情形就像来了黑社会老大。后来我才知道来人是国内某文化名人的公子，已婚。书香门第之子、文化名流之后可以令一女子这样惊吓、畏惧和顺从，令我匪夷所思。再后来又有传闻说Z小姐原是该男父亲（亦即国内某文化大佬）的小保姆即侍女，而且愈传愈为不堪，流走于“昔充太宗下陈，曾以更衣入侍”一路了。

二、打工是留学生之母

早在 20 个世纪 70 年代初，厦门就开始有了出国潮。那时港澳尚未回归，所以去港澳也是“出国”。那时，一个“出国”的人，哪怕就是个打工仔，其身价也比国内的大学生、军人、公务员要高，这就是那个时代厦门大多数年轻人的价值取向，我也未能免俗。我很早就有机会接触海外报刊和小说，海外的生活也早就令我向往。但有出国的机会是在研究生毕业以后，那时候我像处在泥沼里一样，什么事都一团糟，越动弹、越挣扎越糟。后来家里遭遇了极大的变故，更觉得是穷途末路了。人世浮沉荣华，不尽沧桑，我那时还不懂得不能以一时成败知人论世的道理，既然此道不通，那就乘桴浮于海，于是义无反顾，远走东瀛。

来日本前我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，所以来日本的第三天我就开始打工，先是在一个橡胶制品厂，学校开学后又到了西日暮里的一个居酒屋打工。我



曾在十分贫穷的闽西上杭县插过队，日本的打工环境跟那时相比真是天上地下。首先是没有糟透了的作业环境，比如下一次湖洋田（一种类似沼泽的田）腿上便会布满红点乃至溃烂，还有山野里黑压压的蚊子、水田里无处不在的蚂蟥等等。再就是可以在日本可以自食其力，插队时一个工分三分钱，拼死拼活也难以养活自己，这儿打一个星期工，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。还有，插队时我是走资派子弟，属于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，必须比别人出更大的力、吃更多的苦才有前途。这儿我不必刻意表现，出一份力，拿一份钱。唯一难以忍受的是日本人的颐指气使、吹毛求疵，比如洗杯子吧，得洗到倒竖起来一滴水珠不挂，啤酒杯洗干净了还得放在冰箱里冷冻，使杯子看上去像铺着一层薄雪一样。我那时负责洗杯子和调酒，一忙不过来老板就大吼小叫，全无往常那种亲切态度，倒是老板的母亲有时看不过，会来帮我洗杯子。一个月后我成了熟练工，老板态度就变了，有时近乎低三下四，求我加班啥的，不仅每天晚上开车送我回家，有时还要带我去钓鱼，不过我对他印象一点



不好,我觉得他就是经济动物,对人态度好坏取决于是否对他有利。我那时还学会了调一些简单的鸡尾酒,如“蓝色夏威夷”、“玛露伽丽达”,多年后我去了夏威夷尝到真货,才知道我当年调的也就是山寨版的鸡尾酒。

那时每星期约打四次工,每次六个小时,时给650日元,每月有个60000多日元的收入,支付每月28000日元的学费和23000日元的房费,虽无盈余,但也够了。西日暮里可说是我来日本后自食其力的开始。

几个月后我又在池袋的阳光大厦谋到了一份端盘子的差事,时薪虽不高,但离我住的地方近,而且星期六星期天都可以从早上十点打到晚上十点,收入自然增加了不少。

那是家中华料理店,老板在厨房里炒菜,外面的事全交给我们打理。那家店每天的营业额有30万日元左右,老板每天要炒一百多份菜,经常累得一边捶腰一边说“晚上和老婆办不成事了,老婆快要变心了”什么的,这么随便地拿家里的床第之事来闲聊,



对我来说也是很新鲜的。老板颇为和善，但经常说起店里某日本员工家里穷，小时候就开始送牛奶等，面露不屑之色。老板是总经理的女婿，总经理除有太太外还有一个“二号桑”，就是二奶，气质极佳，也经常来店里吃饭，老板对这个二奶点头哈腰，毕恭毕敬。啥叫笑贫不笑娼呢？这就是！这是我当时的直感。

日本人把陪酒卖春叫做“水商卖”，老板说其实所有开店前需要在门前地上洒水的行当都是“水商卖”，饭店也是，都是贱业。有一年，我们对面日本料理店里年轻漂亮的女经理自杀了，据说她也是上层人物的“二号桑”，那一天我对老板有关“水商卖”的见解似乎有所领悟。

我打工时接触的基本上都是日本社会的下层人物，他们年收入在 300 万日元以内，在日本算低收入了，这种阶层一般是有车却买不起房子，但养家糊口是足够了。他们都很敬业，工作起来一板一眼，不糊弄事儿，而且比较坦诚，没啥城府。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，平时最爱谈论的就是女人和床第交欢之事，有



的连得了性病这样的事都会拿出来，一点也不引以为耻。跟着这样的人工作，倒也不必提防什么。我心里不欣赏他们，也不屑于与他们为伍，但不讨厌他们。这样的日子，不知不觉也过了三年，三年后我才第一次回国探亲。

阳光大厦有 60 层楼高，当时是日本最高的建筑，不仅是日本人，外国人到东京也大多要来此地逛逛，这里的各色人等每天熙熙攘攘，络绎不绝，是个十分国际化的地方。那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每年在阳光大厦举办商品展览会，我们店也经常有国内客人前来用餐。我在那家店打了三年工，国内来客是越来越多，出手也是越来越大方，开始只是点普通的面食或套餐，后来常常点的都是店里最贵的菜。中国客人来得多了，我在店里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，开始是跑堂，系着蝴蝶结，穿着小马甲，后来成了主管，穿上了西服，打起了领带，每天想吃啥，厨师就给做啥，这在那时阳光大厦的打工仔中几乎是没的。

国内来的客人有的来头很大，是市长或副省